

夏注《梅堯臣詩》的詩學意義

吳淑鈿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近代學者夏敬觀(1875–1953)於1940年出版了六本唐宋金詩選注，其一為《梅堯臣詩》。¹梅堯臣的詩歌在宋代備受推崇，但元明後肯定其成就者卻不多，清代至後期始由同光派重新提倡。²夏敬觀是同光派中最大力推舉梅詩的學人，對梅詩作了深入研究，選注之外，尚對全部詩作做了校注，³於現代梅詩研究有重要意義，具有探討價值。本論文以夏注梅詩的詩學意義作為研究範圍，考察夏氏選注的詩學思想、詩歌審美觀念與詩史作用。全文就此分為三個部份論述。第一部份討論夏注梅詩所表現的詩學思想。夏敬觀賞識梅堯臣詩，是據清末以來同光派主張「詩品出於人品」的詩學觀念，體認梅堯臣其人其詩之「高」；梅詩表現的寒士精神與君子道德深合夏氏

¹ 各本均收入商務印書館的《學生國學叢書》：《孟郊詩》、《陳與義詩》(上海，1940年)、《梅堯臣詩》、《王安石詩》、《楊誠齋詩》、《元好問詩》(長沙，1940年)。《學生國學叢書》於1925至1940年間刊行，目的是以新法整理古書，適應二十年代整理國故運動興起後，群趨國學研究的青年讀者的需求。王雲五和朱經農的編輯方法是挑選國學要籍，每書選擇精要內容，分段標點，詳加注釋。書前設〈導言〉，介紹作者生平，略敘內容提要，示讀者以研究門徑，便利閱讀。由於讀者對象是未涉國學藩籬的中學或中學以上程度的學生，這些經整理的易讀經典讀本，一方面擴大了接受經典的讀者群，一方面達文化普及的社會作用，使傳統文化獲得更長久的生命力。參劉洪權：〈王雲五與商務印書館的古籍出版〉，《出版科學》2004年第2期(www.cbkx.com/2004-2/562.shtml)。

² 元明間整體論述梅堯臣的資料甚少，明代除了正統和萬曆諸篇重刻集序外，只見於《詩源辯體·後集》的九條。清代論述資料中讚賞梅詩的如《宋詩鈔·宛陵詩鈔序》、葉燮《原詩》及翁方綱《石洲詩話》等，見《中華大典·文學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梅堯臣·論述〉，頁615–22。

³ 夏敬觀校注梅堯臣詩，前兩卷見於1936年《藝文雜誌》，其後曾克崑在香港分別覓得夏敬觀與趙熙的兩種梅詩校注，遂輯為《梅宛陵詩評注》六十卷，請章斗航於臺灣出版。章交當時臺灣參謀總長黎吉璽，黎命吉樹繕正，歷七年完成。見章斗航1982年〈梅宛陵詩評注序〉，載曾克崑：《梅宛陵詩評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3。

的文化理想，其境界比夏氏於唐詩中最推重的孟郊詩更高。⁴ 第二部份討論夏注梅詩所表現的詩歌審美觀念。夏氏肯定梅堯臣在詩學上能學唐而有所樹立，開拓宋詩新境。他一方面推崇梅詩能開多種境界的平淡，一方面強調梅詩開宋詩面目的能鍊和求生新。綜融唐宋，開發無窮境界，也是夏氏的詩學理想。第三部份討論夏注梅詩的詩史作用。夏氏體認梅詩繼承古詩風雅傳統的價值，突出梅詩在創作上的自覺精神，於近代詩壇予以大力提倡，使梅詩得以再受注意。論文最後藉探討朱東潤的梅詩論著特點，歸結夏注的現代梅詩研究價值。

—

夏敬觀屢言生平最欣賞的兩個詩人是孟郊與梅堯臣，尤其後者。章斗航〈梅宛陵詩評注序〉說：「新建夏先生論宋詩，舉宛陵為冠。」⁵ 夏氏亦自謂於古典詩歌研究致力最深的是梅詩，《梅堯臣詩·導言》云：「我生平於宋代的詩，最崇拜的是梅堯臣。他的詩，我研究的工夫，為日最久，致力最深。我如今選他這部詩，覺著比較選他人的詩，有點把握。」⁶ 夏氏崇拜梅詩，緣自他對詩人的道德和寒士精神的肯定；這與他讚揚孟郊詩在持論標準上是一貫的。

夏氏本同光體詩學觀，從詩品出於人品的角度確立梅堯臣詩的價值，指出梅詩表現了詩人的高尚道德。他在〈導言〉中論梅堯臣的詩品曰「高深」，論人品曰「高峻」，並多次評點歐陽修等宋人的評論，認為只有與梅堯臣同時代的人，才能精闢地指出梅詩的價值。⁷ 他引歐評四則：

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六一詩話》）

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用以為歡，而不怨懟，可謂君子人也。（〈梅聖俞墓誌〉）

⁴ 夏氏於唐詩研究中特重孟郊，諸選注本中，唐詩只注郊詩一種。夏氏深識孟郊其人的真摯性行，對其詩的窮、奇、深重新作出評價，為郊詩於中唐詩史中定位。相關論述見吳淑鈿：〈從同光體詩學觀論夏敬觀說孟郊詩〉，《清華學報》新 36 卷第 1 期（2006 年 6 月），頁 273-94。

⁵ 曾克崙：《梅宛陵詩評注》，頁 1。

⁶ 夏敬觀：《梅堯臣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頁 1-6。以下凡引〈導言〉，不另作注。

⁷ 夏氏所有詩論作品皆用評點方式。

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嗚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書梅聖俞詩稿後〉）

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清新，心意雖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噉。初如食橄欖，其味久愈在。……梅窮獨我知，古貨真〔今〕難賣。（〈水谷夜行寄聖俞子美〉）

這四則歐公詩評表現了梅詩的藝術品格及其與詩人人品的關係。「覃思精微」體現藝術構想的深刻；「辭非一體」、「變態百出」是風格多樣化；「其味久愈在」是含蓄雋永。這樣的詩風與仁厚樂易、雖窮愁感憤而不怨懟的「君子人也」密不可分。

夏氏又引其他宋人詩評為據，引張舜民〈張芸叟詩評〉云：「梅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屨，土形木質，雖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引《邵博聞見後錄》云：「晁以道問予梅二詩何如黃九？予曰：魯直詩到人愛處，聖俞詩到人不愛處。」引陸游〈梅聖俞外集序〉云：「先生天資卓偉，其於詩非待學而工，然學亦無出其右。方落筆時，置字如大禹之鑄鼎，鍊句如后夔之作樂，成篇如周公之致太平。使後之能者，欲學而不得，欲贊而不能。」前兩條夏氏寄意鮮明；「雖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與「到人不愛處」正就是人品高峻的君子人也。末條之大禹、后夔、周公則言其詩高古入人，後學難能，歸結梅詩詩品高深。夏氏總結上引宋人諸評曰：「不僅將他的詩品高深，形容盡致，便是他人品的高峻，也借此表現。」他指出聖俞的人品「是仁厚樂易，不忤於物的。其高傲處，是能使王公大人見而屈膝」。梅詩文辭則「是能覃思精微的，是能本人情、狀風物，造清麗、英華、雅正、真切、閑肆、平淡、深遠、怪巧、變化各種境界的，但又是古貨、是土形木質、是不求人愛的；然其氣如春秋之感人，使人不知不覺，悲喜鼓舞，雖嬉笑怒罵，己以為歡，人亦不以為忤」。夏氏評梅詩的詩學思想，於此可見。

夏氏評堯臣其詩其人，表面雖只發揮前人論見，屬評點性質，但其實蘊含深邃的道德理想，包括對古代寒士精神的企慕之情。他由梅詩認取詩人的道德品格，見於選注中各條，如注〈觀永叔畫真〉云：「堅、謂金，明、謂玉，以比內有之文章道德也。」⁸又注〈依韻和永叔勸飲酒莫吟詩雜言〉云：「言無意於高名貴位也。……言雖貧不俯首乞人也。」（頁 177）文學表現人格，是清代宋詩派偏重的文藝審美觀點，夏氏的品味亦沿此路數。他強調「雖貧不俯首乞人」的道德內涵，正與他評價堯臣的「能使王公大人見而屈膝」的「高傲處」相應。再參注〈聚蚊〉一首云：「詩意以喻小人眾多，欺善類而媚顯貴，蝙蝠鳴蟬，以譏臺諫。」（頁 4）注〈和永叔桐花十四韻〉云：「言欲為政者，行平直之道，勿作偽以沽名，假祥瑞以媚上也。」（頁 70）注〈司徒陳公挽詞〉云：

⁸ 《梅堯臣詩》，頁 249。以下凡引用詩注，只列頁數。

「陳執中……然性嚴重，語言簡直，與人少周旋，接賓客以至親戚骨肉，未嘗從容談笑，尤靳恩澤，士大夫多怨之，唯仁宗嘗曰：不昧我者，唯陳執中耳！」（頁 203）又注〈聞高平公歿謝述哀感舊以助挽歌〉（其三）詩末「貧賤常甘分，崇高不解諛。雖然門館隔，泣與眾人俱」數語云：「堯臣於仲淹之文章功業，皆未之深許，且於〈前後靈烏二賦〉及〈諭烏詩〉，深致不滿，蓋仲淹嘗以堯臣叔詢為呂夷簡所拔用，而於堯臣疏之也。此詩末數語，尤為顯明。」（頁 200）夏氏從梅詩見諷諭，又從梅之交友看其同道，於注文中讚揚堯臣在政治上不媚顯貴、不媚上、不媚俗情，不愧行直道而直刺時弊的士人。「媚」與「直」的昭然對比可見。這「直」是一種雖貧而不俯首於人的不屈膝的直。但夏氏說聖俞不惟不俯首屈膝於人，更且能使王公大人見而屈膝，這裏面所講的「貧」的道德可說是寒士精神的最高道德理想，並由此突現夏氏所推崇聖俞的可貴處。所謂寒士精神，是指中國古代早期的中下層知識分子，雖出身貧寒，但意氣昂揚，傲視權貴，具遠大的人生理想，對品格有很高要求的一種進取精神。

林庚說寒士精神的最可貴處在於不肯苟求富貴，不屑低首權貴。⁹這種精神在盛唐和中唐士人中最為昂揚。唐代以來的科舉制度為寒士開闢進身道路，但中唐後由於門閥士族把持科舉，一般布衣入仕艱難，人才積聚在下，遂有韓愈所發的不平之鳴。韓愈在中唐的復古運動中，主張用先王之道重新確立一套治國的世界觀，由科舉選出才德兼備的士人執行政令，並指出有德有能者與王公大人是平等的。〈與鳳翔邢尚書書〉云：「布衣之士身厲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¹⁰把布衣之士與王公大人的相因關係說得透徹，突出了布衣雖賤不諂的寒士精神。論者注意到韓愈同代的文人如孟郊、李翱、張籍等的作品中都表現了道德上的自我堅持，孟郊是最著名的例子。孟郊詩歌發揚中唐復古思潮中重視道德品格的精神，他雖失意道窮而並無放棄貞潔清高，充份表現了寒士的風骨。值得注意的是孟郊乃夏敬觀於梅堯臣之外所最推崇的詩人。夏氏論孟郊時自謂首重詩人性行，稱其「以文章之妙，補綴為衣，遊於王公之門，笑傲自若，將以明其文之在身，亦即道之所存也」。¹¹遊於王公之門而笑傲自若，即韓愈所說雖賤不諂之意。夏氏在〈泗州楊杏城侍郎詩序〉云：

予生平喜唐孟東野宋梅聖俞之詩，……義山官止使下員外，與東野之終於興元參謀，聖俞之終於都官員外郎，數奇正相類。……然則詩人之窮達利鈍，固非其詩有以致之也。……然則詩人之窮達利鈍，又政理之盛衰有以操之。豈其人之詩溫而裕者，遂足以回天之命而利達其身也哉。（《忍古樓文》）

⁹ 林庚：《中國文學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 653，665。

¹⁰ 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 1191。

¹¹ 夏敬觀：《孟郊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頁 23。

孟郊詩下開宋人，夏氏說其詩史地位，是「於貞元元和間，有一無二」。聖俞欣賞孟郊，且嘗以孟郊自喻，¹² 二家詩體詩風相近。夏氏論二家詩，從其人的際遇切入，深感郊梅皆遭逢窮鈍，而其「窮達利鈍」乃「政理盛衰」所致。他說孟郊，稱其人能抱道而終，其詩率情而書，「卻遇著代宗德宗的時代」；說梅堯臣，則稱其人品高峻，詩品高深，但「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引歐序）。然二家雖窮而守潔自高，孟郊詩中「貧士」與「志士」的「飢」與「節」常互見，堯臣詩亦常寄此意，如〈依韻和永叔勸飲酒莫吟詩雜言〉自言厭倦謁見王公的勞苦，寧寫詩自遣：「王公謁請眾去早，既衰愈懶身到遲。……厭此勞苦不喜出，唯有文字時能為。」故夏氏唐詩只注孟郊，宋詩傾力校注梅詩，又常並論郊梅，實以梅為韓、孟以來的寒士精神的發展。韓、孟與梅堯臣是一脈相承的。

夏氏雖並稱郊梅，但兩者之中，他更欣賞梅堯臣，因為梅堯臣比孟郊更貼近他的君子理想。這又要回到「使王公大人見而屈膝」的道德境界上去。韓孟以來的寒士精神，是才德之士保持對王公大人的高傲，做到賤而不諂，詩作能反映民瘼，但這一輩詩人的處窮態度是憤激而怨懟的，帶忿忿不平之氣，故孟郊詩被稱寒苦，其人甚至被元好問稱為「詩囚」（《論詩三十首》），性情的偏狹矯激於此可見一斑。相對孟郊，梅堯臣的不諂於人，更少了一份苦澀感，讓人感受「仁厚樂易」的君子性情，這樣的君子風範令人肅然起敬，使韓愈所說的相資關係再生一推進點；王公大人不只貴而不驕，更見之而心生折服。夏氏選注郊詩，深許其失意亦絕不肯苟且周容：「且吾意雖高，欲致身以事君，未有其力，力在君子之聽納也。」¹³ 孟郊的高，是「眾醉而我獨醒」的自負的孤高，是詩人內心自我感覺的外現，詩人時刻渴望得到君子的聽納。汲汲求仕，情至意切。梅詩的高，則是「一發於詩，用以為歡而不怨懟」的溫厚不怨的「高峻」。〈永叔內翰見過〉一首最能看見堯臣的性行：「固非傲不往，心實厭擾擾。」詩人說自己非因驕傲而不屑競逐名利場，而是實在不耐世俗的紛擾，故家中雖「依舊抱糜粲」，「庭有藜藿」而「壺無醪醴」，卻「乃喜百事稀，來此與世矯」（頁 122）。但堯臣並非刻意逃世的隱者，他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對政治上作偽沽名的事絕不容忍，夏氏注〈和永叔桐花十四韻〉便揭示他對當時「假祥瑞以媚上」的為政者作出尖銳的批判。他在道德上的鮮明自覺與孟郊是一樣的，但他不像孟郊的只居窮守約，而往往能推己及人：「但恨無餘資，豈及療我鄰。筆頭不中書，聊可備急人。」（〈詠

¹² 梅堯臣自比孟郊，意在詩文革新中他與歐公的並肩比力，見〈和永叔內翰〉，載朱東潤：《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 926；〈別後寄永叔〉，載同書，頁 468。歐公亦以郊比梅，見〈讀蟠桃詩寄子美〉，載《歐陽修全集》（香港：廣智書局，未注明日期），頁 15。

¹³ 夏敬觀：《孟郊詩》，頁 21。

懷)故夏氏再申歐公之評價說：「堯臣這人，是有憂思感憤之鬱積的，其詩是多興於怨刺的，是能道羈臣寡婦之所歎的，是能寫人情之難言的。」(頁2)此正梅詩更超過孟郊的境界，其性行表現更合乎夏氏的道德理想，故曰「君子人也」。夏氏一方面將敬仰之情貫注於梅詩的校注與選注中，一方面躬行實踐梅詩之道。章斗航〈新建夏先生傳〉曰：「方嚴持躬，直道事人，持大義不苟毫髮，於後進寒士，獎掖如不及。……凡先生精魂之所蘊結，皆文化瓌寶。」又曰：「先生既精研宛陵，於是遣辭樹骨，具體入神，而又自出新意，守一先生之意而不為所囿，汪師辟置以為此映庵之過人者也。」¹⁴夏氏一生躬行直道，不肯苟且，尤喜獎掖寒士，此正韓、孟、梅之精魂所蘊結，雖然流露其中的是一種士人的末世情懷。

梅詩所表現的寒士精神和君子道德更合乎夏氏的文化理想，這與他作為清末同光詩人的思想本位有關。同光體非常強調「窮」的道德，推崇韓孟一派學者詩人，特別是韓愈。但晚清衛道之士尊崇韓愈，並非欣賞他的不平之鳴，而是出於政治的目的。¹⁵他們想效法韓愈挽救淪亡的道統，也挽救崩潰的政制，力圖維繫舊的一套社會價值觀。陳三立形容當時情況是「去聖日久遠」，「禮樂壞不修」；陳衍也說「今日道喪文敝，殆不讓於五季」。¹⁶韓愈學說既「將個人的道德修養與治國平天下的原理緊密聯繫」，¹⁷同光文人便希望承傳其道以彌補時代缺失。一方面極力尊韓，如陳衍詩云「昌黎道德稱大儒」(〈月蝕詩〉)，又云「昌黎稱大儒，道德亦彌縫」(〈戲作飲酒和陶〉)；另一方面強調士人德學，鼓勵雖窮而守約，「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韓愈〈與宰相書〉)，希望凝聚道德力量，結集人才，恢復固有的政制與秩序。林庚說寒士精神是古代社會上升時期的精神力量，¹⁸同光派於末世標榜寒士傲骨，嚮往的正是這樣的一種精神。由時代背景看，夏氏三十九歲開始校注梅詩，時為1914年，他帶著同光的末代文化情意結評價梅詩之說是可以成立的；¹⁹從這一角度體認夏氏賞識梅詩的詩學思想，乃出於韓孟與梅詩的一脈相承，更且梅詩表現寒士的處窮精神更勝孟郊。然而同光詩人中夏氏是唯一極力推尊梅詩的人，這又要從他的詩學審美理想作更進一步的考察。

¹⁴ 夏敬觀：《忍古樓詩映奩詞合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頁3。

¹⁵ 葛曉音：〈從詩人之詩到學者之詩——論韓詩之變的社會原因和歷史地位〉，載所著《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154。

¹⁶ 陳三立：〈日本嘉納治五郎以考察中國學務來江南既宴集陸師學堂感而有贈〉，載《散原精舍詩》，《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上卷，頁20；陳衍：〈覆趙堯生書〉，載《陳石遺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573。

¹⁷ 夏敬觀：《孟郊詩》，頁141。

¹⁸ 參林庚：《中國文學簡史·導言》，頁5-7。

¹⁹ 夏敬觀：〈梅宛陵集校注序〉云：「予於甲寅(1914)後，閒為引證群書，箋注題下……於全集之當校注者，殆十得六七。」載《忍古樓文》，上海圖書館藏鈔本，無頁碼。

二

夏注梅詩所表現的詩歌審美觀念是強調梅詩能開拓宋詩新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梅詩能開平淡的多種境界，二是肯定梅詩開宋詩的生新格調，兩者都與夏氏唐宋一體的同光體詩學觀有關。綜融唐宋，開發詩歌無窮境界，是夏氏於古典文學發展末期的詩學審美理想。平淡是梅詩研究的老話題，南宋以來論梅堯臣之詩史地位多著眼於此，如嚴羽高舉盛唐而稱賞梅詩學唐人平淡處，方回評梅詩五律平淡豐腴而有味，為宋代第一。²⁰ 胡應麟認為宋詩不及唐詩，梅詩「雖時有宋氣，而多近唐人」。《詩藪》云：「梅詩和平簡遠，淡而不枯，麗而有則，實為宋人之冠。學王右丞者梅聖俞。」²¹ 此等「宋代第一」、「宋人之冠」乃自唐詩風格作肯定，與論者本身的詩學觀念有關，²² 然亦可見平淡乃梅詩藝術最大特點。堯臣自言：「因吟適情性，稍欲到平淡。」（〈依韻和晏相公〉）「中作淵明詩，平淡可比倫」（〈寄宋次道中道〉）。「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讀邵不疑學士詩卷〉）。平淡是詩人在創作上的自覺追求，陶詩是他的學習對象。夏氏說梅詩不惟造平淡，而且是「造清麗、英華、雅正、真切、閑肆、平淡、深遠、怪巧、變化各種境界的」（頁2），則梅詩之平淡與夏氏所體認的各種境界有何關係？這其實寄寓了夏氏站在同光末世的一種士人詩學理想。平淡本是明清學者論唐詩的重要審美標準，胡應麟以梅詩學王維而稱其和平簡遠與淡而不枯，是賞識他得唐人之正宗。明代詩家推崇唐人，稱許右丞者不少。《詩藪》說王詩「窮幽極玄」、「色相俱空」、「世稱正鵠」。²³ 陸時雍說：「世以李杜為大家，王維高岑為傍戶，殆非也。摩詰寫色清微，已望陶謝之藩矣。」²⁴ 屠隆更指杜詩獨缺右丞的平淡：「〔杜甫〕沉雄博大，多所包括，獨少摩詰之沖然幽適，泠然獨往。」²⁵ 右丞詩之空靈幽遠乃平淡表徵，是唐詩派論調。王漁洋說神韻亦沿此路數，獨推右丞之不事雕飾、沖和淡遠、天然而工，以王詩之平淡是一種境界。徐增主唐音，也偏重右丞之無迹可尋。²⁶ 但清代宋詩派對這

²⁰ 嚴羽：《滄浪詩話·詩辨》，載《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頁26；方回：《瀛奎律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卷一，陳簡齋〈與大光同登封州小閣〉，頁13；卷二二，梅詩〈和永叔中秋夜會不見月酬王舍人〉，頁287。

²¹ 胡應麟：《詩藪》，收入《明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外編卷五，頁5616。

²² 參考聶巧平、李光地：〈論瀛奎律髓對梅堯臣五律的評點〉，《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頁150。

²³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六，頁5527；內編卷五，頁5505。

²⁴ 陸時雍：《詩鏡總論》，收入《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412。

²⁵ 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諸家論杜〉，頁2328。

²⁶ 徐增：《而菴詩話》，收入《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426。

種「假天籟為宮商，寄至味於平淡」的詩歌審美取向卻另有體認途徑。²⁷ 由於唐詩派推崇的平淡神韻，多由直尋興會之妙悟而得，強調唯在天分性情，否定學問和功力的作用，因而引起了清人對明人空疏的不滿，主張以學力充實性情。如在翁方綱的肌理說中，便要以經術來充實王漁洋的神韻。覃溪說：「使斯文元氣復還於沖淡淵粹之本然，而後徐徐以經術實之也。」²⁸ 宋詩派的平淡是要以真才實學去表現的，如此才能一矯浮滑空疏之弊。唐宋詩之爭至乾嘉前後，學者多主張調和性情興會與學問功力。²⁹ 清末同光詩人在長期的論爭結束後，雖以宗宋為號召，實從一體相關角度，綜融兩派審美觀，既重性情，也重學力。陳衍即謂：「余生平論詩，必具學人之根柢，詩人之性情，而後才力與懷抱相發越。」³⁰ 儘管經過如此調和，宋詩派所說的性情非盡幽適獨往之趣，所謂平淡也非主王、孟，但是對於平淡風格的推崇已經成為詩界審美的共識。這是夏氏稱讚梅詩平淡的詩學背景。

夏氏推崇梅詩平淡，與唐詩派認為梅詩學王右丞的出發點有所不同。在王漁洋的論說裏，平淡只是王、孟一種境界。而夏氏認為梅詩之好在於能開出多種境界，這正是宋詩勝過盛唐之處。王、孟之平淡雖為唐詩派所崇尚的一種境界，但他們也看到了盛唐境界的變化不多，認為杜甫和宋詩更能開多種境界。如胡應麟說：「盛唐一味秀麗雄渾。杜則精粗、鉅細、巧拙、新陳、險易、淺深、濃淡、肥瘦，靡不畢具，參其格調，實與盛唐大別。其能薈萃前人在此，濫觴後世亦在此。」³¹ 清代宋詩派葉燮說：「盛唐之詩，濃淡遠近層次，方一一分明，能事大備。宋詩則能事益精，諸法變化，非濃淡遠近層次所得而該，刻畫掉換，無所不極。」³² 陳衍也認為盛唐以下，詩歌境界始大：「一人各具一筆意，……初唐猶然，至王右丞而兼有華麗、雄壯、清適三種筆意，至老杜而各種筆意無不具備。大曆十子，筆意略同，元和以降，又各人各具一種筆意。昌黎則兼有清妙、雄偉。磊砢三種筆意。」又說唐宋詩之變乃由開、天、元和的「一人不一其聲貌」而來。³³ 夏氏認為唐宋以後，詩歌境界

²⁷ 王士禎：《師友詩傳續錄》，收入《清詩話》，頁 151。

²⁸ 翁方綱：〈神韻論下〉，載《清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年），頁 597。

²⁹ 吳宏一指出清人論詩一特色是喜調和前人不同主張，在理論上多趨圓融而無偏頗之失。又說神韻格調性靈肌理諸說雖於性情與學力兩方面持論上各有所偏，實則兩者並重。清中葉後詩論則多沿襲舊說，鮮出新義。參吳宏一：〈清代詩學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1978 年），頁 162-78。

³⁰ 陳衍：《石遺室文集·聆風謠詩敘》，載《陳石遺集》，頁 688。

³¹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四，頁 5495。

³² 葉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詩》（與《一瓢詩話》、《說詩晬語》同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外篇下，頁 61。

³³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一八，載《陳衍詩論合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257；〈劍懷堂詩草敘〉，載同書，頁 1059。

仍可不斷開拓，他在〈況夔笙蕙風詞話詮評〉說：「詩詞文章，雖前賢名作如林，仍有無窮境界，待後人開發。書卷醞釀，得之於前人者也，性靈流露，則得之於目前之境地，得之於平昔之學養。」³⁴梅詩既能臻於王維的平淡之境，又能在前賢之後開發多種境界，將學養和性靈融為一體，自然最符合夏氏的論詩理想，此其「宋詩之第一人」之義，而且處於末世，背負著歷代文學遺產豐富積累的重壓，「仍有無窮境界，待後人開發」的觀點，也無疑是為行將衰亡的古典文學樹立了可以繼續發展的信心。由此看來，夏氏對梅詩的提倡又有證實這種觀點的當下意義。

比較孟郊，夏氏更欣賞梅堯臣，這與梅詩之平淡有關。在歐陽修的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中，梅堯臣遠承中唐詩歌的現實精神，而中唐詩特別是歐、梅等繼承其道的韓孟詩派，並不以平淡為上。韓孟詩派以其時代因素，失意科場的寒士基於一種「變態的審美心理」，取拙險之調，作苦澀生硬之詩。堯臣在宋代所開的新境，則能於韓孟的古硬苦澀中見蘊藉閑雅與平淡天然。梅詩於古硬中所見之平淡是造平淡，即朱自清所說是韓詩的「艱宕怪變得，往往造平淡」。³⁵葛曉音說：「梅堯臣的平淡中又自有『古健寫奇秀』的氣骨，使韓孟盧仝的苦辭險韻和硬語臻於圓熟，最後造成平淡淳厚的境界。」³⁶梅詩滲透著古健的氣骨，但渾然天成，平淡淳厚而無孟郊的苦澀味。再者梅詩能開多種境界，孟郊不能，故夏氏更為推重。

夏注梅詩所表現的另一詩歌審美觀念，是肯定梅詩開創宋詩之生新。他在〈導言〉中就歐評的「辭非一體，變態百出」引伸出「一種淺說」，概括為三個方面：

- (1) 熟意鍊生，生意鍊熟；熟意不能鍊之使生，則是稗販古人的陳舊思想；古人既已說過，要你說他做甚，生意不能鍊之使熟，則說來不自然，妙處不表現。
- (2) 熟辭鍊生，生辭鍊熟；熟辭不能鍊之使生，則顏色朽敗，生辭不能鍊之使熟，則斧鑿痕跡太露。
- (3) 熟調鍊生，生調鍊熟；熟調不能鍊之使生，則閒架呆板，不能脫去一種腔殼，生調不能鍊之使熟，則怪模怪樣，看去不順眼。

三條所論，都在強調生與熟的關係。他說梅詩在意、辭、調三方面都表現了鍊的工夫，由此可體現夏氏綜融唐宋的詩學觀。「生新」是宋詩藝術特點。宋人佳處在生，在務去陳熟，而唐詩派之弊在熟，在未求生，故夏氏主張作詩要生中鍊熟，熟中鍊生。〈導言〉就上述「淺說」指出梅詩生與熟的具體表現：

³⁴ 《同聲月刊》2卷2號，頁42。

³⁵ 朱自清《宋五家詩鈔》說：「平淡有二：韓詩云……梅平淡是此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梅堯臣〉，頁1）

³⁶ 葛曉音：〈北宋詩文革新的曲折歷程〉，載《漢唐文學的嬗變》，頁243。

堯臣的詩，在第一項中，凡人人用正面寫的，他卻用反面寫；人人用反面寫的，他卻用正面寫。人人愛說的意思，他卻不說。人人不說的，他卻要說，又能聚集許多瑣碎的意思，貫串成文。人們讀之，祇覺其妙，不覺其雜。在第二項中，人人整用的，他太半打碎了用。人人零用的，他卻整薹的用。一字之鍊，必有來歷，而人不覺。在第三項中，往往挪移前後次序，使章法變換，不見其首，不見其尾，令人捉摸不定。

梅詩獨創於「人人」之外者，便是化熟為生。「而人不覺」，「令人捉摸不定」，則是鍊得爐火純青。他指示後學云：「讀者就我上所說的三項，仔細研求，必能悟到那不可言而告的妙處。」（〈導言〉）意在就梅詩之能鍊和求生新，說明其開宋詩面目的詩史意義，在善於學唐而能有樹立。梅詩能開中國詩歌新境界，此夏氏推崇之由。而力求以生鍊熟，熟中求生，又正是處於末代的詩歌開發無窮境界的具體途徑。夏氏在這方面躬行實踐由梅詩所體現的「淺說」，追求開創自家面目的理想。〈近代詩鈔述評〉云：「劍丞為皮鹿門高足，今之學人，於詩尤刻意鍛鍊，不肯作一猶人語。……喜其能自樹立，不隨流俗為轉移耳。」³⁷

總而言之，夏氏選注梅詩所表現的詩歌審美觀念，是一方面詩要平淡自然，開多種境界；一方面詩要熟中鍊生，有所樹立。此其綜融唐宋、開闢無窮境界的詩學審美理想。兩方面的內在關聯，是希望藉此挽救古典詩歌的生命，在文化上是一種不甘沒落的時代心理。

三

夏氏選注梅詩的詩學意義，再可就其表現的詩史作用說。夏氏體認梅詩繼承古詩風雅傳統的價值，突出梅詩在創作上的自覺精神，於同光派中獨力提倡，使梅詩於新時代得再受注意。上文論述夏氏突出梅詩，是透過對其道德內涵的認識，強調士人精神；這與他肯定古詩傳統，對梅詩風雅觀念表現的體認是有關係的。夏氏於〈導言〉開篇即強調梅詩合於風雅：「他的詩，是十五國風，是大小雅，是士大夫潤色的里巷歌謠。」繼引歐陽修〈梅宛陵集序〉云：

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聖俞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

³⁷ 陳衍：《陳衍詩論合集》，頁 873。

他說此語乃「透過數層，不是尋常恭維的門面話」（頁1）。歐序所含義蘊，乃北宋詩文革新的時代精神，針對唐末五代到西崑的詩道之衰而發。要了解此中要義，才能掌握他讚美梅詩的真正內涵，和梅詩於傳統風雅觀念的體認，從而領略夏氏引述的深意，找出他強調梅詩合於風雅的論述目的。歐、梅等領導北宋詩文革新，是為了掃蕩當時浮偽的文風，與他們的政治思想有密切關係。³⁸

宋初承五代，文風浮豔，調悲格弱，柳開與王禹偁起而矯之。柳、王都標榜復古，但道不相同。柳開學韓，重道輕文，好空談高言。王禹偁不好空談道統，於創作中倡言復古，合中唐新樂府諷刺時弊及古文運動推崇道德的精神，明確標舉以風騷為本的詩道。王禹偁〈還揚州許書記家集〉云：「生無風教興王化，死無勳爵貽孫謀。可憐詩道日已替，風騷委地何人收。」³⁹這一觀念已開歐、梅之先，但後起之西崑文人為粉飾太平，依然標榜傳統的「越風騷以追二雅」，專取「無有怨謗，吟詠情性，宣導王澤」的詩。⁴⁰歐、梅變革由漢至唐以騷為變風的傳統詩教觀，推崇風騷的正面評價。梅堯臣常被引述的〈答韓三子華韓五持國韓六玉汝見贈述詩〉一首表達了他的詩論思想：「聖人於詩言，曾不專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興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謂國風。雅章及頌篇，刺美亦道同。不獨識鳥獸，而為文字工。屈原作離騷，自哀其志窮。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蟲。邇來道頗喪，有作皆言空。煙雲寫形象，葩卉詠青紅。人事極諛諂，引古稱辨雄。經營唯切偶，榮利因被蒙。」⁴¹明確提出雅頌也要以刺美為根本，正式統一興諷刺美與怨嘆成為風雅觀的完整內涵，發展了白居易以來肯定風騷怨刺的詩觀。⁴²歐陽修與梅堯臣是詩文革新的同道者，對梅詩表現的詩歌觀念深為賞識，故藉讚美梅詩，指出「憂思感憤」與「興於怨刺」的關係，意在揭示士人的社會責任感。由夏氏的寒士理想觀之，他引錄「透過數層」的歐序，當亦深有同感。他在〈導言〉開篇先落實梅詩合乎風雅傳統，歸結梅詩詩品高深時又引《後村詩話》一條：「本朝詩，惟宛陵為開山祖師，宛陵出而後桑濮之哇淫稍息，風雅之氣脈復續。」皆因梅堯臣的風雅觀與他對梅詩的寒士精神和道德內涵的認識是一致的。

³⁸ 參葛曉音：〈北宋詩文革新的曲折歷程〉，頁215。

³⁹ 王禹偁：《小畜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電子版），卷一二，無頁碼。

⁴⁰ 楊億：《武夷新集·溫州聶從事雲堂集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電子版），卷七，無頁碼。

⁴¹ 朱東潤：《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336。

⁴² 葛曉音：〈從詩騷辨體看「風雅」和「風騷」的示範意義——兼論歷代詩騷體式研究的思路和得失〉一文指出梅堯臣風雅觀的歷史意義：「如果說白居易還沒有完全承認騷的怨思和風人美刺的一致性，那麼梅堯臣就比白居易更明確地把美刺和自哀其志等同起來了。」載《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3期，頁120。

夏氏對梅詩繼承風雅的體認，與他強調梅詩「是古貨，是土形木質，是不求人愛的」有關。詩人在創作上能堅持自我，既不歌功頌德以取悅上位者，甚至不在乎朋輩的欣賞與否。劉熙載〈詩概〉云：「聖俞詩深微難識。即觀歐陽公云：知聖俞莫如修。常問聖俞生平所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極賞。是其苦心孤詣，且不欲徇非常人之意，況肯徇常人意乎？」夏氏〈劉融齋詩概詮說〉評點此條曰：「此條既明指品格，則非謂不討人說好可知。愛好，固非不入品格者也，誇耀於人，又當別論。文章之事，實至名歸，自炫無濟也。」⁴³是聖俞與孟郊一樣，胸中有抱負，堅持己道，性行上孤高自賞，創作上具高度自覺精神。夏氏也評郊詩不求人愛，然而郊詩的不求人愛與梅詩是有分別的。孟郊詩古貌古心，反映性行褊隘的文化心理，不虛飾自己，不求人愛表現真摯的最高境。⁴⁴梅詩反映人品高峻，是王公大人見而屈膝的君子風度，不求人愛表現刺美精神的深刻內涵。但二人詩歌的不求人愛，都體現了逆時矯世、獨立自負的反流俗精神。梅詩比郊詩更博大，自覺繼承風雅傳統的思想也更合乎夏氏的時代文化心理，故夏氏特加推重。

夏氏是清代以來最大力提倡梅詩的學者，這方面也表現了梅詩研究的詩史作用。元明以後，如朱東潤所云，由於重唐不重宋，推許梅詩者甚少，直至清末始被重新提倡，《石遺室詩話》所載可作說明：

初梅宛陵無人道及，沈乙庵言詩，夙喜山谷。余偶舉宛陵，君乃借余宛陵詩亟讀之，余並舉殘本為贈。時蘇戡居漢上，余一日和其詩，有「著花老樹初無幾，試聽從容長醜枝」句，蘇戡曰：「此本宛陵詩」。乃知蘇戡亦喜宛陵，因贈余詩有云：「臨川不易到，宛陵何可追。憑君嘲老醜，終覺愛花枝。」自是始有言宛陵者。⁴⁵

同光派中陳衍和鄭孝胥都喜歡梅詩，陳衍說：「余蓋與蘇戡首表章宛陵者。」⁴⁶1937年陳衍編《宋詩精華錄》選梅詩二十四首，是宋初詩人中作品數量最多的一位。但陳衍是由另一角度欣賞梅詩的。《石遺室詩話》卷十四云：「宛陵用意命筆多體香山。」⁴⁷陳衍晚年最稱香山，以白詩最得清新真摯之旨，又認為宋詩乃由白詩變化而來，⁴⁸甚

⁴³ 夏敬觀：《詩概詮說》，載所著《唐詩說》（臺北：河洛出版社，1975年），頁149。

⁴⁴ 吳淑鈿：〈從同光體詩學觀論夏敬觀說孟郊詩〉，頁285。

⁴⁵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一〇，載《陳衍詩論合集》，頁133。曾克崙在〈論同光體詩〉中亦轉引此段，載鄭健行、吳淑鈿（編選）：《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粹（1950-2000）》（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2。

⁴⁶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一四，載《陳衍詩論合集》，頁197。

⁴⁷ 同上注，頁198。

⁴⁸ 陳衍云：「白詩之妙，實能於杜韓外，擴充境界。宋詩十之七八從《長慶集》中來，皆能以不平變化其平處。」（《陳衍詩論合集·石遺先生談藝錄》，頁1020）

至主張將同光派標舉的杜韓蘇黃換成杜韓白蘇，皆因山谷詩雖固佳而「實無若何深遠高妙處」。⁴⁹ 可以說，清末梅詩得再受注意，陳衍有大輅椎輪的作用，⁵⁰ 但對梅詩大力褒揚，確立其詩壇地位的，則是夏敬觀。夏氏〈梅宛陵集校注序〉云：「歲甲寅，予在北京，朋曹約於陳后山逝日，設祭法源寺，座間論及宋代之詩，予舉宛陵為冠，羅子揆東、楊子昀谷不避予言，昀谷且賦詩為辨，有宛陵僅造一關之語，雖一時戲言，如二子者，豈不知宛陵，談諧談詭，至可玩味也。」⁵¹《詩話》卷十四云：「劍丞謂唐宋詩人獨有一梅聖俞耳，昀谷大非之，稍訾及宛陵。因取決於余。余平解之曰：論詩固不必別白黑而定一尊，劍丞言似太過。然十數年前，蘇戡有與余詩云：『臨川不易到，宛陵何可追。』」陳衍說詩不必尊於一家，純就創作上「利在易肖，弊在太肖；不肖不成，太肖無以自成也」的學詩利弊而言。⁵² 同光詩人於詩確多不尊主一家。鄭孝胥曰臨川易到，宛陵難追。曾克崙引申說同光詩人學韓不到的，總要在王門走一遭，因為荊公是宋詩中一條比較易走的路，又說梅詩造到平淡地步，轉覺難覓賞音。⁵³ 夏氏獨排眾家之見，力追宛陵，校注之外，又加選注，〈梅宛陵集校注序〉云：

夫宛陵詩，宋固已顯矣。歷元明至清，轉趨沈寂。宋詩若半山東坡山谷后山簡齋，莫不有為之詮注者，幾於家誦戶籟；獨於宛陵之詩，未嘗有探索蘊積，闡其宗風，以告當世學人者。豈膾炙羊棗，口之於味，嗜有不同，至大羹不和，大音希聲，則喻者難之耶？⁵⁴

期以「探索蘊積，闡其宗風」的時代責任自許，發掘梅詩的深刻內涵和思想價值，在明人論梅詩之「第一」後，再於新時代衡量其兼具開創與稱冠的「宋詩之第一人」的雙重意義。然而夏氏對梅詩的體認知之者少，他的寂寞也透現了自己「不猶人」的論詩自覺。無論如何，夏氏除了服膺梅詩，在創作上亦身體力行，且得時譽。石遺說：「劍丞詩最佳者，……用筆造語，皆得髓於宛陵而神似之，世之服膺宛陵者，一時恐未有其匹。」⁵⁵ 汪辟疆論同光詩人各有所宗時，亦說夏氏學梅詩而詩名夙著：「夏劍丞之學宛陵，……皆能本其所學，發為高文，樹骨堅蒼，吐辭典贍，皆學有餘於詩外

⁴⁹ 陳衍：《陳衍詩論合集·石遺先生談藝錄》，頁 1013。

⁵⁰ 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云：「石遺初則服膺宛陵山谷，憂憂獨造，迴不猶人。晚年返閩，乃亟推香山誠齋，漸平淡。」又云：「〔沈曾植〕與陳石遺相遇武昌，乃始為宛陵山谷之詩。」載《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頁 300，302。

⁵¹ 夏敬觀：《忍古樓文》。《石遺室詩話》及曾克崙〈論同光體詩〉都有記述此事，見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一四，載《陳衍詩論合集》，頁 196；曾克崙：〈論同光體詩〉，頁 12。

⁵²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一四，載《陳衍詩論合集》，頁 197。

⁵³ 曾克崙：〈論同光體詩〉，頁 12，11。

⁵⁴ 夏敬觀：《忍古樓文》。

⁵⁵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一四，載《陳衍詩論合集》，頁 197-98。

者也。]⁵⁶可說夏氏是梅詩於近代的知音。

總之，夏注梅詩表現了他對詩歌傳統的價值體認與創作上的自覺精神，他的論析與提倡在梅詩研究上實具詩史作用。

上世紀六十年代，朱東潤對梅堯臣詩作了更深入的研究，現代學者研究梅詩都以朱注為主。⁵⁷但朱氏的編年校注，不少是以夏氏的校注為根據的。朱東潤自述於1960年至1965年間探討梅詩，⁵⁸至文革後才出版《梅堯臣傳》（中華書局，1979年）、《梅堯臣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和《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三種著作。⁵⁹他得到夏氏梅詩校注的稿本，以夏本為主要參考對象，於各本傳注的序言中都表示對夏氏的研究十分推崇。⁶⁰從朱氏的論述可知，他意在為詩人作出身、生活、學習、詩風轉變等多方面的評價，而聚焦在梅詩深刻的現實性上，豐富了梅詩平淡的論述層面，也批判了詩人的「仁厚樂易」而指出其為「鬥爭性」的一面。⁶¹將朱氏的梅詩觀點與夏氏的論述作比較，便突顯了兩者由於時代背景不同而認取的意義有別。朱注固然具有現代梅詩研究的重要文獻價值，⁶²而夏氏作為清代同光體末期的詩人，在古典文學的衰微階段，本傳統士人情懷和極力維繫古代文化價值的苦心，就自己的文學欣賞品味和詩史觀念，認取梅詩藝術精神深具經典意義的一面，推介與當時的年青讀者，這樣的選注意義也實在是值得回顧及細味的。

⁵⁶ 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頁301。

⁵⁷ 王水照稱朱東潤的編年校注是「迄今為止最佳的梅集定本」。見〈三副筆墨鑄詩魂——朱東潤先生的宋代文學研究〉，《文匯報》（電子版），2007年1月27日。

⁵⁸ 陳尚君：〈朱東潤先生的治學方法——以《梅堯臣傳》為例〉（載《文匯讀書周報》〔電子版〕2006年12月15日）說朱氏寫《梅堯臣傳》始於1963年4月1日，到同年10月23日脫稿。梅堯臣三書，寫成於六十年代前期，中心是《梅堯臣傳》。

⁵⁹ 朱東潤另有梅詩論文三篇載《中國文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關於梅堯臣詩的一些議論〉（1962）、〈梅堯臣詩的特點〉（1964）、〈梅堯臣作詩的主張〉（1964），頁222-58。〈梅堯臣詩的評價〉原載《中華文史論叢》第七輯（1978年），頁255-80。

⁶⁰ 朱氏於《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前言》說得到呂貞白「惠借所過錄的夏敬觀先生《梅宛陵集校注》的稿本」（頁1）。

⁶¹ 朱東潤：《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258。另陳尚君〈朱東潤先生的治學方法〉說朱東潤推崇梅堯臣在一系列政治事件中表達了耿介而不趨附的立場，可作「鬥爭性」的注腳。

⁶² 朱氏《編年校注》的著述用心主在考察梅詩與北宋政治史的關係，為寫《梅堯臣傳》作文獻準備。

The Significance of Xia Jingguan's Annotation of *The Poetry of Mei Yaochen* in Chinese Poetics

(A Summary)

Ng Suk Tin

Xia Jingguan published six volumes of selected annotations of Tang, Song and Jin poems in 1940, one of which being *The Poetry of Mei Yaochen*. Mei Yaocheng's poems were highly acclaimed in the Song dynasty, but not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In late Qing they became popular again thanks to the Tong Guang School, in which Xia was the one who most strongly recommended Mei. We can examine the significance of Xia's annotations of *The Poetry of Mei Yaochen*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emphasis on the spirit of scholars hailed from a humble social origin and the gentleman's ideals in his poetics; second, the expression of aesthetic notions that synthesize Tang and Song poetics and develop infinite poetic realm; and third, Xia's recognition of Mei's *fengya* 風雅 heritage and the impact of Xia's promotion of Mei's poems on the history of poems in modern studies of Mei's poems. The paper concludes by underscoring the values of Xia's annotations in regard to modern studies of Mei's poems.

關鍵詞：夏敬觀 《梅堯臣詩》 同光派

Keywords: Xia Jingguan, *The Poetry of Mei Yaochen*, Tong Guang School

